

安史之乱严重削弱了唐王朝的实力,造成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到9世纪初的时候,已有四十多个藩镇。据《新唐书·兵志》记载,他们“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削弱了中央集权,使唐后期的政局混乱不堪,并最终导致其灭亡。

一、唐代地方行政体制的缺陷是藩镇产生的主要原因

唐代的州数,“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账,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三”<sup>①</sup>。而和唐朝同样是疆域广阔的汉朝“至哀、平之际,凡新置郡国六十三焉,与秦四十合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sup>②</sup>。我们可以看出,汉朝的郡数只是和它同级的唐代的州数的三分之一,在同样广阔的疆域范围内,汉代郡要比唐代州的面积大。作为同级的汉郡和唐州是中央和地方联系的交接点,其数量的多少和行政区划的面积大小,会直接影响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终唐一代,州的数量一直保持在三百个以上,而且又是中央直接管理,这样便产生了所谓:“率计天下三百余州矣……则两千石安得三百余人耶”<sup>③</sup>之叹。唐前期强化中央集权时所隐伏的这种内在矛盾,暴露了地方两级制的缺陷。因此,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在地方行政区划上再加一级,把两级转变为三级制,以减少中央直接管辖太多的地方行政机构而带来的种种问题。在州之上再设一级地方行政区划,在唐初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唐初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制,本来是为了削弱地方权力,想保持内重外轻、权力集中于中央的格局,从而达到防止因地方权力过重而导致再度出现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的分裂。但是由于州数太多,中央无法控制,早在贞观元年就分天下为十道,“隋季丧乱,群盗初附,权置州郡,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贞观元年,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东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陇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剑南道,十曰岭南道”<sup>④</sup>。这十道便是十个监察区,推行不定期的监察制度。到开元年间设置了十五个采访使道,从主观上来说,唐王朝不愿意推行三级制度,希望保持州县两级制,以维护中央的绝对权威。但是要在这样一个地广人多的国家里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势必会导致地方的权力过小,而削弱了地方发展经济和靖绥御侮的功能。例如,地方长官并无兵权,而边防地区又不能没有军事防御,所以在武德年间就已经设立了总

管府,“高祖受命之初,改郡为州,太守并称刺史。其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以统军戎”<sup>⑤</sup>。武德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后因四边多事,对边区的都督加使持节,增其权力,称节度使,为一方军事大员。以后,为了让节度使有更大的靖绥地方的权力,唐王朝被迫将军、政、财、监大权全集中在节度使一人身上,又因边区联防的需要,常使一人兼摄数镇。于是边区因军事的需要而实行了三级制,而内地还是两级制,内重外轻的格局很难继续维持,最终于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九日,爆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起兵反唐。为了平定叛乱,内地也遍设藩镇,至德以后,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藩镇割据的形势已定,地方行政区划形成了实际上的三级制。这样的地方行政体制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而正是这一缺陷,导致了中唐后期藩镇的出现。

二、兵制的变化与改革为藩镇的形成提供了军事基础

隋末唐初,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有所削弱,唐王朝掌握了大量的无主田,统治者把相当一部分的官田用作赐田、公廨田、驿田、屯田,以供禄米、经费和其他军政开支之用,其余大部分用以实行均田制,即作为永业田和口分田分配给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占有。由于均田制度的重新编制和巩固,在均田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府兵制度也大大充实起来。

府兵大都是从均田户中选拔充任的,“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才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sup>⑥</sup>。这可能是根据唐初的制度而言。府兵在入伍以后,他们的军籍属于折冲府,他们的户籍和垦田仍然属于州县。府兵的户籍和垦田计帐和一般的民户完全相同,只是名隶折冲府的丁男,在他们的户籍上注明“卫士”而已。府兵入伍以后,在平常的日子里,还是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三时耕稼”,“一时治武”,“父兄相言,不得他业,籍藏军府,伍散田亩”<sup>⑦</sup>。只是在每年的冬季十一月,由折冲府召集,“教其军阵战斗之法”<sup>⑧</sup>,这才离开家庭,去折冲府指定的地点集结,参加操练。此外,就是去京师上番宿卫、防戍处防戍,或出兵打仗时,才会离开他们的家乡。因此,府兵都没有脱离农民的身

份,他们除了按时集中训练和宿卫上番以外,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可以在自己的份地上进行农业生产,即使离开家乡从征、戍防,所受的份地也还是由他们的家属来耕作,从这方面来看,府兵制基本上是兵农合一的。

唐十道一共有五百六十六个折冲府,关内道独占二百七十三府,陇右道占二十九府,河东道占一百四十一府,三道相加,就是四百四十三府,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三还多,而全国折冲府又都分别隶属于十二卫和东宫六率,轮番戍卫京师,称为禁卫军,所谓“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sup>⑨</sup>。这种军事上内重外轻的布局对于唐前期的统治巩固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起到了有利作用,是当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局面并保持不了多久,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很快也走向衰亡。

唐初,国力强盛,那时构成军队核心的府兵,固然兵役负担很重,但是由于他们分配到足够的永业田、口分田,府兵本身也能够免去自身的租庸调,因此他们的战斗力也比较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时代,国家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遭到破坏。府兵授田很难足额,有些府兵户除了保有二十亩永业田之外,连一亩的口分田地也没有分配到,这样他们的经济就逐渐衰退下来,府兵原来本是一种禁卫军,要轮番戍卫京师,故当时“谓之侍官,言侍卫天子”<sup>⑩</sup>。既称为“侍官”说

## 唐代藩镇形成的原因探析

□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李帮儒



中国汉代画像石上的  
乐歌百戏中的假面和假形

## 汉代百戏考略

□ 石河子大学 刘希里

百戏在中国古代流传很广,千百年来传演不衰。百戏,是我国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1979年我国出版的《辞海》中,百戏是指“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它“包括各种杂技幻术(如扛鼎、寻幢、吞刀、吐火等)装扮人物的乐舞、装扮动物的鱼龙曼延以及带有简单故事的《东海黄公》等”<sup>[1]</sup>。“百戏”一词,今知较早见之于《后汉书·孝安帝纪》:“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sup>[2]</sup>这次罢遣发

明他们本身的地位很高地,但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衰退,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当时十二卫府的将军不是由无能的外戚来担任,就是由归顺唐朝的番将来统帅,十二卫府的僚佐也都是当时的权要子弟,这些将佐们渐渐地把直番的卫士当作“童奴”。这样一来,人们认为当“卫士”是一种耻辱,于是“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sup>[8]</sup>,而关东一带人民为了避免当府兵,竟然“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sup>[9]</sup>,这样一来,府兵的素质和战斗力也就大大降低了。

府兵戍卫边疆,旧制以四年为限,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由于战争的继续进行,府兵是“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sup>[10]</sup>,也常常是长期住在边疆,他们家中的一小块田地也就荒芜了,再加之府兵授田不足和兵役负担的繁重,府兵的家庭生活就自然是很困难的了。府兵戍卫边疆,很多战死疆场,然而一些边将又往往恃宠违败,没有把真实的情况报告给唐王朝,所以战死疆场的卫士,他们原籍的户籍却并没有注销。有些官员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就以此为借口,要这些卫士的家属补缴,这些府兵的家属损折了人丁不算,

生在东汉殇帝延平元年(107)冬十二月,是时殇帝新丧,十三岁的刘祐刚自外藩入登大位,主政者仍是邓太后,罢斥之旨当由太后决定。曼延应是似后来舞龙之类的巨兽表演,鱼龙即鱼龙变化,注引《引官典职》对此释之甚详:“作九宾乐。舍利之兽从西方来,戏于庭,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鱼,嗽水为雾,化成黄龙,长八丈出水遨戏于庭,炫耀日光。”鱼龙曼延的

描写已见于《汉书·西域传赞》,然其与“百戏”的连称则应重视。《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门外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顺帝幸胡桃宫临观之。”此处与角抵相连称,语义上又从属于角抵,无非是要补说角抵戏中包含的演出门类之多,与《史记·大宛列传》中“觱抵奇戏”所指为一物,都是在注解角抵戏,故而该处集注曰“角抵之戏则鱼龙爵马之属”,简述其品种,自然间又略去那个“百”字。无论西汉抑或东汉,百戏就是角抵戏。东汉时虽出现了“百戏”一词,但还远不如“角抵戏”之称普遍,还要与“鱼龙曼延”、“角抵”等连称,而未见单独使用。从演出品类繁盛多变的意义上言之,是谓百戏,从演出形式及其内涵的

还要补缴过去免缴的租庸,其困难不可想象。唐王朝就是用这种残酷的方式来对府兵的家属进行剥削的,唐代的府兵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瓦解的。

府兵虽然没有战死沙场,有些也会被残暴的边将虐待致死,于是府兵大量逃亡,使府兵的兵源更加枯竭,从而也使府兵制度陷入瘫痪状态而无法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招募壮士充实士兵来源的方法应运而生。招募的对象是均田户、自耕小农转向的逃亡客户,当然表面上看,这种招募是自愿性质的,而实际上也带有强制性。强致招募的戍兵的戍边年限从三年、四年、六年以至变为“无有还期”<sup>[10]</sup>。到了开元二十五年(737),唐王朝索性下敕:“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招募丁壮,充边军”<sup>[10]</sup>,称之为“长征健儿”<sup>[4]</sup>。从此以后,更番戍边的制度不复存在,招募的“长征健儿”便成为终身的职业兵。戍边的兵卒演变为“长征健儿”是当时军事制度上一种很大的变化。

自从府兵制度破坏以后,戍卫京师的人数,到天宝元年(742),只有六万左右,而边防的人数却发展为四十九万,形成所谓“猛将精

尚武精神而言,则称角抵。与较晚出的“百戏”一词相比,“角抵”似乎更能表明中早期戏剧的嬗变之迹,更能代表其时代风貌,由秦而历两汉,“角抵”都是中国戏剧的标志性总称。

《庄了·徐无鬼》就曾谈到,南市宜僚以弄丸,名于时。旧注称:“南市宜僚善弄丸,常八个在空中,一个在手。”《列子·说符》也记载宋国兰子弄七剑,五剑常在空中。在两千多年前,人们便掌握了这种技艺,实属难能可贵。《史记·苏秦列传》也说,战国时,齐都临淄的人不仅“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而且也普遍参与斗鸡、走犬和蹋鞠。至于拔河,则相传楚将伐吴,设此戏“以为教战”,后遂流传民间,相沿不绝。还有角抵,“或曰战国时之戏”。秦二世也曾聚集艺人,表演过角抵、俳优之戏。只是秦代以前的百戏表演,尚处于肇始阶段,远不如汉代那样规模盛大、节目繁多。《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引《汉元帝纂要》: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后乃有高绶、吞刀、履火、寻幢等戏。”这是指百戏达到一定规模、被集中起来为人表演是在秦汉之时。百戏,汉代谓之“角抵戏”,因其节目繁多,健美活泼,后世遂通称之为“百戏”。

在汉代,百戏的管理机构主要是乐府,乐府隶属少府,负责人为乐府令丞,而其手

兵,皆聚于西、北”<sup>[10]</sup>的局面,此前关中的兵力足以制驭四方,而现在却完全颠倒过来了。唐初,府兵之置,“四方有事,则命将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无握兵之重”<sup>[4]</sup>。后来边境置节度使,开始的时候,边帅还是四年一任,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需要富有战斗经验的将领来担当方面之任,于是在府兵变成“长征健儿”的同时,边帅也有专任数十年而不调换的,如平卢节度使安禄山,自从天宝元年为节度使,一直到天宝十四年,前后任平卢节度使十四年之久。由于边帅久任地方,而府卒在变成“长征健儿”之后,又完全归边帅节制,边帅的权力自然就日益膨胀起来了。节度使与军镇上的“长征健儿”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边帅专军的局面,这是造成地方割据势力形成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刘昫:《旧唐书·地理一》[M],中华书局,1975.
- [2]杜佑:《通典·州郡一》[M],中华书局,1988.
- [3]王溥:《唐会要·刺史上》[M],中华书局,1955.
- [4]王应麟:《玉海》[M],上海书店,1987.
- [5]杜牧:《陈允吉校点·樊川文集·原十六卫》[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6]刘昫:《旧唐书·百官志》[M],中华书局,1975.
- [7]王溥:《唐会要·府兵》[M],中华书局,1955.
- [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兵制》[M],中华书局,1975.
- [9]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 [10]司马光:《资治通鉴》[M],中华书局,1956.